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5.003

“复制”曹雪芹的可能性

——评阎真小说《活着之上》

朱一帆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阎真小说《活着之上》探讨了市场经济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方面,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圣人文化意象群”促使小说主人公聂致远探索人生终极价值;另一方面,世俗的生存哲学诱使聂致远放弃理想追求现实利益。是安于“活着”的状态,还是追求“活着之上”的崇高,成为以聂致远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一生亟待解决的问题。大数据时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圣人的崇高精神被他人领会不再困难;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知识分子可以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被他人快捷地接受吸纳。现代社会,让他人大规模地“复制”自己的思想而获得永恒的地位,也不再意味着必须经历现世的生存艰辛与贫困,“活着”与“活着之上”二元对立的调和已成为可能。

关键词: 《活着之上》; 现代知识分子; 精神困境; 曹雪芹; 崇高精神; 市场经济; 大数据时代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5-0015-06

引用格式: 朱一帆. “复制”曹雪芹的可能性: 评阎真小说《活着之上》.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5): 15-20.

Possibility of “Duplicating” Cao Xueqin: Comment on Yan Zhen’s Novel *Above Living*

ZHU Yif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Yan Zhen’s novel *Above Living* explores the dilemma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the “sage cultural image group” represented by Cao Xueqin promotes the protagonist Nie Zhiyuan to explore the ultimat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worldly philosophy of survival also forces Nie Zhiyuan to live up to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orld. Being content with “living” or pursuing the sublimity of “above living”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modern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Nie Zhiyuan need to solve in their lifetim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big data age makes it not difficult for others to comprehend the noble spirit of the saint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the way that devotes your lifelong energy to write a book and win immortal fam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way to make your thoughts emulated by others by modern social tools. Allowing others to “copy” your thoughts

收稿日期: 2019-07-08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信视野下的新世纪河南长篇小说创作新变研究”(2019-ZDJH-711)

作者简介: 朱一帆(1989—),女,河南洛阳人,郑州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含旧体诗词)。

on a large scale and gain eternal life no longer means the hardships or poverty of living in the world, and the harmonious opposition between “living” and “above living” becomes possible.

Keywords: *Above Living*; modern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dilemma; Cao Xueqin; lofty spirit; market economy; big data age

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泰然自处,是历代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昌明年代,既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可如范文正公登岳阳楼,吟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还可如曹雪芹呕心沥血创作《红楼梦》。易代之际,这一问题更成为检验知识分子人格操守、理想信念的不二法门,无数文人于此折戟,如窃弄国柄、勾结金人的秦桧,反叛朝廷、横行凶逆的吴三桂,以及窃国者汪精卫等,但更多的知识分子还是以“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的笃定,坚守信仰与道义,如沉江而亡的屈子、精忠报国的岳飞、抗元名臣文天祥、民族英雄林则徐等。是“为稻粱谋”,还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向现实低头,还是在困顿中坚守信仰,是摆在无数知识分子面前的抉择。抚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1],追昔“曹雪芹们”高山仰止的崇高精神追求,作家阎真推出长篇小说《活着之上》。通过对主人公聂致远在“活着”与“活着之上”之间抉择的描摹,小说探讨了当代知识分子超越生活经验而活着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语境中,在知识分子被资本裹挟的滚滚洪流里,《活着之上》对知识分子追求理想与绝对价值的合法性的肯定,对当下知识分子的自处乃至每个个体的自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作为意象存在的“曹雪芹”

小说《活着之上》以聂致远对儿时死亡记忆的回想为开端。回忆里,在爷爷出殡的早上,聂致远“看到爸爸把爷爷的头扶起来,将几本厚厚的书塞在他的头下,是《石头记》,黑色的封面上就是这三个泛白的字。爸爸说,这是爷爷唯一的遗嘱。好多次我看见爷爷在出太阳的时候搬了椅子坐在门前,把这书摊在膝上,老花镜夹在鼻间,手指点着书慢慢移动,晃着头在读。这景象持续

了好多年”^{[2]4}。这是曹雪芹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虽然是以《石头记》的作者身份潜在显现。如果说这时的曹雪芹形象是感性、困惑且模糊的,那么在17年后,当聂致远与红学研究者赵教授攀谈后,曹雪芹形象在聂致远眼中就变得具体而抽象了。具体指的是因经济困窘,曹雪芹写作并病歿于门头村,死后无人刻石碑,但是,穷而后工,在穷困凋敝之际,他完成了传世之作《红楼梦》;抽象指的是曹雪芹的精神追求,迫使聂致远开始思考人生在世的意义与价值,他那世俗的人生哲学,也“被震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2]9}。小说中曹雪芹的第三次出现,则颇具反讽意味。为解用钱的燃眉之急,聂致远竟想到去门头村寻访曹雪芹字画卖钱,结果自然是被现实狠狠教训。用曹雪芹字画换钱而不得的疯狂举动,也让聂致远意识到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他选择了背向主流社会,背向荣华富贵,背向人们所仰慕和渴求的一切。他改变了世界吗?没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吗?也没有。既然没有,他的选择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自由。心灵的理由是不是能够成为充分的理由呢?清高和骄傲摧毁了他的现实生活,却成就了他的历史形象。”^{[2]55}至此为止,曹雪芹形象在聂致远那里已完整且明晰。在聂致远看来,少年时代的曹雪芹生活在钟鸣鼎食之家;到雍正初年,因受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其祖父被革职抄家,举家迁居北京,从此家道衰落;北归后的曹雪芹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举家食粥常晷”是生活常态。但是贫病交迫并没有让他向生活妥协,他选择背离大众、遗世而独立,在与时间的对抗中,完成绝世之作《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其子殇,因禁不起丧子之痛,曹雪芹于是年除夕卒。这样的曹雪芹,在聂致远看来是无法企及的,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所谓“我是聂致远,不是他们”^{[2]55-56}。从这个意义

上说，聂致远眼中的曹雪芹已经不只是一个有着文人风度的士人形象，不论这指的是他“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裕瑞《枣窗闲笔》）的外在形象，还是其风骨高洁的内在精神。曹雪芹形象在聂致远眼中已化作一种文化意象，一种包含着聂致远对什么是知识分子“应该过的”生活的期望。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化意象既是对现实物象的再现，又是与之相关形象的再生，其放进了主体的期望与思想。这样一种文化意象，其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对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一种指引。^[1]也就是说，在聂致远眼中的曹雪芹，已经部分脱离了作为本体存在的曹雪芹，这一形象被聂致远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而在本体形象与被赋予的内涵两者的结合过程中，曹雪芹已然由一个实在存在的个体，转换为蕴藏着巨大精神内涵的意象，而这样一种意象，其本质指向的是人如何在时代潮流中自处，人“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更进一步而言，作为文化意象而存在的曹雪芹，在小说中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同样追求精神信仰的孔子意象、陶渊明意象、李太白意象、苏东坡意象一道，共同构成了一种“集体人格”，一种“圣人文化意象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评价着人们现世的行为和制度，指引着他们未来的规划与行动。

那么，作为文化意象存在的曹雪芹，其究竟指引聂致远“应该”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聂致远在结尾的一段表述，或许可以解开这一谜题：时空浩渺无涯，自我渺若微尘，先行者用自己的血泪人生昭示的，正是个体应当在自我之上活着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无限时空的背景之下，个人有必要去表达对世界的意义，个人有必要超越生活经验而活着。^[2]^[309]在这个意义上，曹雪芹意象指向的是个人要超脱现世的精神追求，不能沉迷于对物质生活的追逐，这也就是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在儒家传统文化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除了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之外，还包含着一种对“义”的追求，而“义”才是个人应该追求的人生价值与意义。传统儒家道德把伦理德行看作立身之本，如果人的存在仅限于“苟为生，苟为利”（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的层面，则与动物无异。也是由此，“曹雪芹意象”指向的是君子耻于言

利的儒家传统，而摆在聂致远面前的，实际上是一条追随圣人脚步、忘利取义的道路，追求“义”的价值，是聂致远“应该过的”一种生活。但是，“应该过的”和“实际过的”生活，本就是两种不同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在市场经济时代，自觉以凡人自居的聂致远，时刻在“义”与“利”之间摇摆，在“活着”与“活着之上”之间挣扎，这便也造成了市场经济语境下“聂致远们”的困惑。

二 市场经济语境下“聂致远”的困境

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意味着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知识分子出售自己作品以获得利润的权利。这不仅意味着国家层面肯定了知识分子卖文获利的合法性，同时也颠覆了传统儒家文化中士大夫“耻于言利”的传统。在传统儒家社会，士大夫秉承“学而优则仕”的信念，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国家统治阶层的职位。这之后，士大夫的全部经济来源便是国家俸禄，国家为他们解决了生存的后顾之忧，只要继续成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那么他们的俸禄便由国家持续发放。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意味着士大夫科举入仕的道路被斩断，他们依靠考试进入国家统治阶层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自然，国家也不再为这些士大夫的经济生活负责。一个问题也由此浮出水面：在没有国家长俸供养的情况下，这些士大夫应当如何在社会上谋求生存。可以说，《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不仅为这些士大夫指明了道路——出卖自己作品获取经济利益以养活自己，同时也再一次断绝了他们借助官职获取终身俸禄的可能性。至此，传统士大夫由古代的政治特权阶层、由古代拿取国家长俸的士人阶层，转变成为了“鬻文为生”的商人，士大夫从“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逐渐转变成为四民之末。^[4]经济来源的不同导致的政治身份转变，造就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至于文人对于钱财的看法，也由传统古代社会的“耻于言利”逐渐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合法谋利。如1910年的《小说月报》创刊号上，便刊登了《征文通告》一则，上写：“本报各门皆可投稿，短篇小说尤所欢迎……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5]关注

自身生存问题,书写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成为诸多文人的写作常态。郭沫若在写给成仿吾的书信中,感叹“节省,节省,节省!万事都是钱,钱就是命!”^[6];抗战时期老舍因经济压力大,自言“苦闷得像一条锁在柱子上的哑狗”^[7],等等。自然,这其中也就有了现代知识分子于活着和活着之上的困惑与纠结。生活困窘时的沈从文,忆及“北漂”经历,直言当初的自己“把军籍的名涂抹后,来到北京,因为穷,学着人写着一点小说之类,誊好后,另纸加上谦卑的书信,送到这家那家报馆去,从每千字中取出五毛左右的报酬来,养活着自己,在我一年来,是如此度过……未来的生活,又包围了我。回头既不能,写五毛钱或一块钱一千字的文章因为病也不大容易写出了,因此一来,我才想起把这些稿子,胡乱的汇拢来,再卖一次”^[8]。满纸所见皆为生活,满心所想皆为生存,彼时的沈从文是被生活包围的,困窘的经济状况,让他无暇考虑纯粹意义上的崇高理想。还有丰子恺,公开登报说明自己漫画价格:“立幅(高约二尺,阔约一尺)银六圆;扇面银三圆”,并写有详细的价格面洽处,并指明此价格仅限于民国廿四年内,“以后如续应则另订。”^[9]¹⁸³自然,有被生活现状困住手脚的文人,也就有为气节“宁折不弯”的人,如不食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誓饿死不失节”^[9]²⁴⁹的北大教授缪金源。可以说,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诞生之初,它便与“金钱”有了牵扯不清的关系。不论是困窘年代的“鬻文为生”,还是为气节“宁折不弯”,都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在“活着”与“活着之上”的选择困惑。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世纪,市场经济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聂致远同样面临着是选择生存还是选择崇高精神的困境。

这首先体现在聂致远的学业上。因研究生选导师时想要学明史,聂致远错失了跟着院长做学问的机会,他感叹“在这人生的艰难时刻,在鲜活的生活面前,一个‘好人’的评价实在是太苍白了”^[2]⁵。这是聂致远选择“活着之上”后的首次碰壁。之后在博士导师的选定上,读博之后是选择好好做学问还是靠写书挣钱上,以及毕业答辩、找工作上,聂致远都处在两难困境中——是听从内心、守住知识分子的操守,还是同流合污、为利益不择手段。在找到麓城师范大学的教职后,聂致远

又面临着工作上的困境,如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院系贫困生的认定、职称论文的发表、院系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除了这些困境外,聂致远自然还面临着家庭生活的困境——是为虚荣向亲戚们显阔,还是守好自己那微薄的收入;是为孩子倾囊相买,还是量体裁衣、适可而止;是为妻子赵平平转正“走后门”,还是按部就班地继续等待;等等。生活于聂致远而言就是“钱钱钱”。应付好生活,已是聂致远能够做到的最好结果,这诚如他自己感慨:“好好活着,活在当下,一切于此无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不必上心。这是生活给我们的启示。”^[2]³⁰⁸⁻³⁰⁹但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尤其是“先行者用自己的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又告诫他应该探求一种超越生活之上的精神,一种可以对抗时间而存在的崇高。那么,仅就这个层面而言,现代知识分子聂致远的困境,与百年前郭沫若、沈从文等文人的困境无甚不同。但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现代知识分子聂致远不仅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同时他也存在于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并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10]那么,在大数据时代,身处“义”与“利”不可兼得,或者说应付生活已疲惫不堪之困境的聂致远,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崇高这一难题,能否得到解决呢?“复制”曹雪芹,像曹雪芹一样,过一种“应该过”的生活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

三 大数据时代“复制”曹雪芹的可能性

一个残酷但却颠扑不破的道理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的生是平凡的一生。或许,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广泛涉猎延展自己生命的广度,但是这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一生是平凡的这种现实。换句话而言,如果没有什么能将自己的一生与古往今来无数人那样默默无闻的一生区别开来的话,那么这段人生就是平凡、普通且平庸的。有鉴于此,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或者国家权力才会去强调崇高、壮美于个人生活的重要

意义，提醒个人不要堕入平庸生活这一陷阱。正如有学者所说，“不管是在孔子的经典中，还是在孟子的话语里，权威的劝诫总是关于自我改变、自我改正、戒色、戒过分的本能欲望，以取得更高的集体目标。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里，尤其如此。”^[11]其实，古往今来的诸多文人志士，至少那些有闲心、有余力来思考这些人类生存困境的人，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在有了这一对人生的基本判断后，他们中的有些人选择在现世努力投入，试图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如古希腊三贤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以著说立传的形式，向后人传递智慧；又如古老中国社会的孔孟圣人，他们以自己“仁”的学说影响他人、辐射后世。可以说，一个人只有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才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一个人必须努力活着，让自己的思想被他人知晓，尽可能多地被更多人、更久地传颂，他才能对抗时间的无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终获得一种永生。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获得永生，那么他需要做的，就是扩展自己的人生，奋力让它成为值得传颂、可以影响他人思想的人生。这样的话，通过他人的复制，人生就有了附加值。要努力去活，别人才会注意到你，尽管微不足道，但我们要回击时间的冷酷无情，只能这么做。^[12]¹⁵⁹这或许正如作家阎真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只要意识到了时间，他就跟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伟大的时间面前，人的一生如电光石火，有必要那么认真吗？这是这种敏感带给我的负能量。但也有正能量，那就是以自己的方式战胜时间。这也许就是我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的一个主要动因吧。看到几千年前的文字，《诗经》《离骚》和《史记》等等，今天还在我们的心中闪亮，就有了无限的崇敬和向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一个自己不存在的世界里，还有人在读自己的书。这也许有点虚幻，自己都不存在了，这世界跟你还有关系吗？但这就是信念，信念是不会被理性主义的逻辑摧毁的。”^[13]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阎真选择通过让后世之人阅读自己文学作品的方式，“复制”自己，让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被他人传颂，以抵抗时间的残酷。他认为，这是一种让自己获得“永生”的方式。

一般意义上，古往今来的圣人，或者在历史上

名垂青史的人，他们都想他人大规模地复制自己，也就是后世之人以自己的学说为思想信仰，以自己的行为为行动指南，他们想要让自己的人生细节被后世之人领会、体悟进而模仿甚至复刻。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干出一番值得传颂的事业，而这样一种被传颂的事业的达成，“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当代社会令人惊叹的科学技术，大数据时代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工具的广泛应用，公众贴吧到个人博客的无所不在，为我们思想的被“复制”、为我们事业的被传颂省去了诸多麻烦。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与荣耀之间只有一条推特的距离。”^[12]¹⁶⁰

微博界有这样的比喻：当你的粉丝超过100人时，你就像是一本内刊；超过1000人，你就像个布告栏；超过1万人，你就好比一本杂志；超过10万人，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0万人，你就成了一家电视台。^[14]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微博粉丝数超过1000万人时，他的影响力堪比一家电视台。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一个人的人生细节、一个人的思想感受、一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等等，都被他人观看、审视。借助这些自媒体对个人人生价值的传播与强调，诸多粉丝或者慕名者也会追寻其脚步，探寻人生的意义、时间的边界，抵抗岁月的侵蚀。如莫言在自己微博中呼吁大众要用毛笔书写，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在对这条微博的评论中，就有许多人声称希望能像莫言一样永远谦卑、永远不满足、永远坚持。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借助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力量，莫言对人生价值的肯定、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等思想，不仅被他人便捷触碰，甚至更有可能被他人“复制”，成为他人人生道路上的价值典范。诚如有学者指出，微博和微信里的“关注”，是由个人的投注和保留编织而成，“好友”是那些肯主动进行关注的人。今天的科学技术，让我们交出了自己的关注和信念，让我们不再自己去冒险往前探路，而是以他人的经验作为正能量，去指导自己的人生。^[15]就小说《活着之上》而言，就小说中主人公聂致远而言，在大数据时代，想要“复制”曹雪芹，想要如曹雪芹那样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不再变得艰辛与困难。也就是说，让自己的思想被他人知晓进而被他人传颂，并不

一定意味着困于贫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活着之上》的“副文本”,小说封底的一行标注“阎真粉丝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yanzhenhzs>”也提醒着“正文本”中的聂致远,“活着”与“活着之上”或许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当经验向我们展示生活的真理时,我们可以借助对真理的理解,借助现代科技,向他人更便捷地展示我们对世界意义的理解、对人生边界的感悟。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待遇较低,对有些人而言,坚持对知识真理的探索,就意味着生存无以为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现代知识分子进行“形而上”的探索,显得不近人情。就这个层面而言,部分知识分子世俗化、向现实生活低头,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作为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脊梁,知识分子应当扛起探寻人类精神维度、揭示人类生存境遇的大旗,用自己的思想力量,指引人类在真善美的道路上前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知识分子需要效仿古代伟人的思想与行为,效仿他们为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壮举。但是,效仿古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重现古代大家在残破生存状态中的“左冲右突”,在艰难生活境遇里的发愤著述。我们效仿古人的目的,是为更宏大的伦理道德目标服务,是在大数据时代,借助外力,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东西,以反哺大众的精神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曹雪芹等古代士大夫的“复制”,更大程度上意味着要对他们的存世之道进行现代性转化,即我们要在继承古代杰出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创造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财富。在这个意义上,《活着之上》对知识分子“如何活着”这一问题的探讨,

为当下知识分子的自处以及平凡个体的自处,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阎真.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J].南方文坛,2005(4):109.
- [2] 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 [3] 王世达,陶亚舒.中国当代文化理论的多维建构[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39.
- [4] 李怡,张中良.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83.
- [5] 《小说月报》编辑部.征文通告[J].小说月报,1910(1):3.
- [6] 阿英.无花的蔷薇 现代十六家小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256.
- [7] 老舍.老舍书信集[M].舒济,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156.
- [8] 孙玉蓉.书边闲语[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8-9.
- [9]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 [10] 张其金.大数据时代下的产业革命[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6:3.
- [11]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5-96.
- [12] 丽贝卡·戈尔茨坦.谷歌时代的柏拉图[M].李鹏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13] 阎真.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零距离表达:《活着之上》写作随感[J].当代文坛,2015(5):128.
- [14] 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广东省新闻学会.岭南传媒探索[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4:35.
- [15] 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M].许煜,陆兴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27.

责任编辑:黄声波